

韦伯与桑巴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之比较

孙田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00;

摘要: 不同于卡尔马克思从唯物辩证和阶级批判的角度解释西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 马克思韦伯与维尔纳桑巴特都从精神层面寻求资本主义的起源, 但二者在关于奢侈与节俭, 犹太人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 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群体等问题上却存在明显的分歧。从表面来看两人的观点甚至是两个极端, 但这背后蕴含的是两人对资本主义实质的不同理解。通过对两人论证逻辑的考察能够对西方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有更全面的理解。两人对经济运行中精神支持与约束, 奢侈与节俭, 生产与精神关系等问题上的深远见解, 对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深刻意义。

关键词: 韦伯; 桑巴特; 中国式现代化; 资本主义经济

DOI: 10. 64216/3080-1486. 25. 07. 033

1 理性与阶级: 思想的渊源

卡尔马克思称“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增殖, 肆无忌惮地迫使工人为生产而生产, 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2]126}这一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积累过程。在此过程中, “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和基础……成为随后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的基础。”^{[1]138}。尽管韦伯与桑巴特所处时空相似, 二者所汲取的学术思想有同源之处, 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亦有差别。

韦伯在求学期间受德国新历史学派及奥地利实证经济学影响颇深, 继承了新历史学派强调经济活动中伦理道德因素的观点, 在探究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中重视精神的源头, 从新教伦理中挖掘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根基。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与以往西方经济学家最显著的差别就是, 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 相反,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形式早已在世界范围内长久存在。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一书中, 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定义为“一种依赖于交换机制以谋取利润的行为, 或者说是一种依赖于形式上的公平交易的行为”^{[3]6}。韦伯心目中理想的能够代表西方近代合理化趋势的资本主义是以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为特征的理性资本主义。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定义不仅将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与过去的工商业形式作出区分, 也将殖民地掠夺与投机行为等资本原始积累活动划出理性资本主义的范畴, 所以韦伯所探讨的资本主义起源, 是他所建构的西方近代独有的理性资本主义的起源。

桑巴特与韦伯同样是德国新历史学派出身, 但与韦伯有所不同的是, 他早期的经济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生涯早期, 桑巴特支持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划分的方法和观点, 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化和批判思想, 他写道“人们当将自己的目光注射到那些商人身上, 特别是那些栖亚那的商人……自十三世纪以来是被委任收取并传送教皇金钱的人”^{[4]5}。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中, 桑巴特又从新历史学派及韦伯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研究中得到启发, 认可宗教活动对于资本主义的源头作用。然而桑巴特对资本主义有着与韦伯不同的理解, 桑巴特眼中的资本主义不同于满足需求的生产和消费, 是与奢侈消费相勾连的, 无节制的贪婪的产物。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不一的理解, 他与韦伯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研究结论。

2 时空与人群: 差异的聚焦

定义的差异促使韦伯和桑巴特在追溯资本主义萌芽、壮大等具体历史方面产生了看似矛盾的对立, 然细究之下实则仍是立足于同一德国唯心主义史观的立场。

首先, 从时间而言, 桑巴特对“起源”一词所指代时期的划定是, “在制度混杂的时期中有许多种制度相互争雄……把这个同一短时间看做互相连接……这个过渡时期或成为一种经济制度将消亡的后期, 或成为他起源的早期”^{[5]1}。因此桑巴特侧重探讨的“起源”, 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从个体经济的萌发伊始, 资本主义就进入了起源时期, 直到资本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经济制度为止。对韦伯而言, 他关心的是“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同惩忿禁欲的新教伦理观念之间的联系”^{[3]15}他所说的“起源”一词比起经济形式的过渡更偏向于精神的变迁, 。

桑巴特的奢侈动力论可简单概括为 13 世纪末发现

新大陆,白银开采、借贷业务日益兴盛使欧洲出现大量摆脱封建经济的财富,也促使一批脱离封建经济的新富翁诞生,并培养了奢侈的欲望,“色情主义决定性影响的生活模式……财富、性自由、人口中某些集团谋求优势的努力、对大城市生活的偏爱”^{[5]82}等因素为一过程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桑巴特认定资本主义起源于财富无需与封建地位挂钩的那一瞬间,即财富阶层下移时,资本主义便开始萌芽,进入了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起源时间横跨13至17世纪,历经数百年时间才最终占据统治制度地位。桑巴特所审视的起源时期如此漫长,究其根本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模糊的定义令他的目光必须放得更远,甚至远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述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前。

韦伯所讲的“理性资本主义”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末期及之后,他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精神源于16世纪新教改革后流入世俗的禁欲主义。相较于经济资本对传统经营的注入,韦伯更看重全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引发的变革,“只要有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且表现出来,那么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3]51}。但最终资本主义的形式与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也只有兼具二者才是韦伯认为近代西方独有的“理性资本主义”。

从群体上来看,韦伯与桑巴特所认定的资本主义奠基人天差地别,二人是从不同视角出发分别锁定了供需两端展开论证。桑巴特以顶层视角出发,他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关注到的奢侈动力是由消费群体所创造的,他们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王公贵族、高级教士和新富翁,这其中唯有新富翁类似韦伯心中的资产阶级代表。韦伯明确表示能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不是传统的商业贵族,也不是靠投机掠夺发家的人,而是继承清教禁欲主义的,保持勤俭的工业中产阶级,也就是桑巴特所说的“节俭者”。韦伯的论证始终紧扣“合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是禁欲主义世俗化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精神不但不能是纵欲享受,反能够被视为对贪婪的约束,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是勤于工作积累资本的手工业者、批发商、建筑企业……

从表面看互为矛盾的结论实际却可作为一个完整的资本辩护过程。第一,由奢侈消费所创造的市场需要生产者的商品供给,在贵族与投机者大肆泼洒钱财之时,并存着一批辛勤工作积累资本的中产阶级。桑巴特看到了新市场的开拓,从需求端着手从而得出上流社会的消费需求奠定了资本主义形式的出现的结论;韦伯从供给端起始,看到中产阶级理性工作积累资本的过程。尽管二者结论相反,但他们都承认彼此的存在,正如桑巴特

所言“每当他们(挥霍者)想到总会有足够数量的节俭者在保障必要的资本再生产和积累,就会聊以自慰”^{[5]150}。第二,两人的相同之处是在论证时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都忽略了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初始过程——掠夺与剥削。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初始资本,创造资本的过程就是分离劳动者与劳动条件所有权的过程。桑巴特的奢侈动力论直接探讨掠夺钱财的挥霍而将资本原始积累视作默认的前置条件,韦伯则将资本积累归于节俭的积累,矛盾的二人在此时都走上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道路,拥抱了德国唯心史观,对精神的探究成为二人的共同立场。

3 新教与犹太教:信仰的动力

“纵观历史,宗教群体在试图影响人们的经济态度和经济行为方面,一直面临着两难困境。”^{[6]328}。宗教本身就是精神和信仰的集中表达,它对经济制度的影响是韦伯与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思想无法绕开的部分。

韦伯对比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与非理性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理性的现代生活方式对应。新教徒所具有的排斥享受、勤俭工作等特质被韦伯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俗世生活中传播对传统经济制度有着冲击性的作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新教各流派皆有分析,诸派中他尤其肯定加尔文宗及在其基础上的清教分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促进作用。加尔文宗肯定了俗世工作的地位,将获得的利益解释为上帝的恩宠,选民为确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必须进行资本积累,将赚钱作为目的本身。清教不仅将赚取利益的多少作为上帝选民的标准,更是将这种勤俭到近乎疯狂的苦行僧生活从修道院带入俗世生活。在成为上帝选民的宗教愿望指引下,工作本身才能成为目的,韦伯所设想的“理性资本主义”才能得以运转。

桑巴特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犹太教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原因。他认为流散至西欧的犹太人为其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犹太人对经济生活发展最深远也最具革命性的影响,或许在于他们从事了新商品的贸易,而为了生产这些商品需要用新方法代替旧方法”^{[8]47}。犹太人推动建立了国际贸易、现代金融和证券交易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动力在于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具有适合资本主义萌发的独特精神气质,可简要概括契约精神与财富追求。犹太教严格服从经典中上帝的训诫,以此展现自身民族的优越性,这种遵守延续到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

极强的契约精神。桑巴特认为正是犹太人言出必行的契约精神使他们能够在信贷和现代证券交易中大展拳脚。在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规训道,“一个人为了使他的劳动得到最高报酬,采取劝说的方式来夸耀他的货物,这当然是很正常的。我们说这样的人是有雄心的,而且会成功的”^{[9]149}。如桑巴特所言“犹太人的观点是‘现代’的观点:犹太人用现代人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8]156},这种商业道德和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竭尽全力追求利益的精神确有相通之处。

综合两人的论证可以发现,韦伯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核心是将积累财富作为任务本身,表现为节俭勤奋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桑巴特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于对自由贸易的追求,对“现代”经济方式的利用。两种宗教在服务于不同定义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服务于资本主义的不同侧面。

4 反思与价值:当代的指引

韦伯与桑巴特对资本主义的思考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工业社会剧变,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与贪婪、掠夺和工业冷漠相伴而生。韦伯认为源自于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工业社会发展初期的动力,也是资本主义财富应当具有的伦理涵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不可抑制地壮大,宗教的约束在不可挽回的褪去,“财富与纯粹的世俗情欲相连”^{[3]173},资本主义正在失去终极的价值引导,在理性的牢笼中机械地逐利与享乐。桑巴特则认为,是资本主义本身将人们带入了扭曲的时代,造成金钱价值至上,精神、消费、生活、劳动等方面被一种价值所支配,失去创造性,即“失神化”,“国家从这个立场去看仅是各种利益的障幕”^{[12]27}。

探索精神与经济的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1947年,费孝通与吴景超在中国社会学社第八届年会上,针对中国工业化前途提出了两条相对的工业化道路。吴景超认为“机器生产,是效率高的生产,手工生产无法与之竞争”^{[13]119},支持中国从根本上进行城市的,机器的工业化,工业化与都市化是大势所趋。费孝通则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提出通过分散的乡村工业,尤其是加以对手工业的重视,在传统体系下吸收机器生产技术达到工业化。一点重要理由在于,费孝通见证了西方都市工业化过程中机器工业对人的异化,“从一个在机器上做工的人说,他的活动是在服侍机器”,因此人成为机器一部分是“不合理和不人性的悲剧”^{[14]56}。在建国以前,中国的社会学者就已经看到了精神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今天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在面临实践以及背后的精神问题时展现了超乎想象的中国智慧。韦伯与桑巴特的节俭动力论和奢侈动力论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调控与需求创造这两个重要环节,信仰分别提供了资本积累与市场竞争的合理性及动力。倘若只讲经济纯量膨胀而忽略精神根基就会出现“单向度的人”,只讲精神信仰而忽略实际手段则难以发展经济。中国式现代化如今正在走一条有涵义的、强大的经济发展之路,审慎结合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的关系,为经济提供合理、合人性的价值追求是重中之重。综上所述,韦伯与桑巴特对经济动力的思考在今天仍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M]. 何小禾, 编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
- [2] 姬金铎. 韦伯传[M]. 河北: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01.
- [3]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龙婧, 译.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
- [4] 维尔纳·桑巴特. 现代资本主义[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5] 维尔纳·桑巴特. 奢侈与资本主义[M]. 王燕平, 侯小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6] 罗纳德·L. 约翰斯通. 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 原书第8版[M]. 袁亚愚, 钟玉英, 译.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 [7] 马克斯·韦伯. 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M]. 康乐, 简惠美,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1.
- [8] 维尔纳·桑巴特.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 [9] 塔木德[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 [10]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1]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陈望道, 译.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2.
- [12] 维尔纳·桑巴特. 德意志社会主义[M]. 杨树人, 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 [13] 吴景超.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14] 费孝通. 《费孝通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M]. 吕文浩, 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作者简介: 孙田(2001年-), 女, 汉, 山东青岛, 硕士在读, 内蒙古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 文化人类学。